



党报生存环境研究

DANGBAO SHENG CUN HUANJING YANJIU

刘 赞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本书得到河北大学“中西部大学综合实力提升计划工程”专项基金资助
“河北大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党报生存环境研究

DANGBAOSHENG CUNHUANJINGYANJIU

刘 赞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党报生存环境研究 / 刘赞著. -- 保定 :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666-0737-9

I. ①党… II. ①刘… III. ①中国共产党 - 党报 - 新闻工作 - 研究 IV. ①G21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5976号

责任编辑: 梁志林

装帧设计: 王占梅

责任印制: 靳云飞

出版发行: 河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河北省保定市五四东路180号

邮 编: 071002

印 刷: 保定市北方胶印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32 (880mm × 1230mm)

印 张: 9.2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9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66-0737-9

定 价: 28.00元

目 录

绪 论	(1)
-----------	-------

第一章 党报生存环境回顾	(5)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党报生存环境简述	(5)
--------------------------	-------

一、党报早期的生存环境	(6)
-------------------	-------

二、抗日战争时期党报的生存环境	(12)
-----------------------	--------

三、解放战争时期党报的生存环境	(25)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党报生存	
---------------------	--

环境简述	(33)
------------	--------

一、党在全国执政后为党报发展创造了有利 条件	(33)
---------------------------------	--------

二、党报在媒体格局中一家独大	(40)
----------------------	--------

第二章 党报生存的社会环境	(48)
---------------------	--------

第一节 党的生存环境对党报生存环境的影响	(49)
----------------------------	--------

一、“党管党报”的原则不变，党报的性质、 作用不变	(52)
------------------------------------	--------





二、新时期党对党报营造了良好的生存发展空间	(68)
第二节 政治体制改革对党报生存环境的影响	(89)
一、政治体制改革激发了公众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感	(89)
二、公众民主意识提高、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对党报的影响	(93)
第三节 经济体制改革对党报生存环境的影响	(104)
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为党报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104)
二、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使党报的商品属性凸显	(107)
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党报报道内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12)
第四节 社会阶层分化对党报生存环境的影响	(116)
一、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使受众的细分成为必然	(116)
二、党报应对社会阶层分化和受众细分的思路	(120)
三、在阶层分化、受众细分的背景下，党报应更加注意为弱势群体代言	(127)
第三章 党报生存的媒介环境	(132)
第一节 党报与国外媒体的共存与竞争	(133)

一、世界多极化背景下意识形态的对抗依然存在，党报要当好党和人民的喉舌，做到守土有责	(137)
二、经济全球化使媒体的经济属性日益凸显，党报与国外媒体对市场的争夺不可避免	(146)
三、我国传媒业“走出去”与国外媒体竞争面临的问题	(155)
第二节 党报与电子媒体的共存与竞争	(171)
一、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电子媒体在传播方面的优势	(172)
二、报纸与电子媒体竞争的优势	(174)
三、党报在与电子媒体特别是新媒体竞争中应注意的问题	(181)
第三节 党报与市场化报纸的共存与竞争	(197)
一、市场化报纸发展历程的简要回顾及其对党报发行的影响	(197)
二、党报在与市场化报纸竞争中的优势	(202)
三、党报应学习、借鉴市场化报纸在采编经营方面的经验	(206)
四、党报报业集团要处理好集团内部党报与子报的关系	(211)





第四章 党报改善生存环境的着力点分析	(216)
第一节 在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服务的过程中 改善党报生存环境	(216)
一、在新闻宣传上要把体现党的意志同反映人民 心声统一起来	(218)
二、在经营管理上要力争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 双赢	(226)
第二节 在与读者互动的过程中改善党报生存 环境	(245)
一、增强读者意识, 充分满足读者对党报的信息 需求	(246)
二、努力吸引年轻读者和基层读者	(258)
结 语	(268)
参考文献	(276)

绪 论

本书所说的“党报”，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某一级党委机关报，即党中央机关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机关报、各地（市、州、盟）委机关报。其涵盖范围也包括党成立初期的机关报（如《向导》周报、《热血日报》等）、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时的机关报（如《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晋察冀日报》等）。本书引用的某些统计数据中，因原统计者的因素，“党报”这一概念可能还包括由中央、省（区、市）委宣传部直接领导的报纸（如《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

自诞生之日起，党报就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宣传舆论阵地。革命战争时期，党报是党宣传自身主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一个有力武器，也是群众了解党的观点、意见的最重要渠道，对于党夺取政权、推动革命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党在全国执政初期，各级党委领导下的党报成为人民群众了解党的方针政策、获悉党务政务信息的主要途径，也是当时新闻信息发布的主体，对于党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发挥着重大作用。在上述过程中，党报的主体地位和主流作用得以确立，成为我国新闻事业的“龙头”



和“旗舰”。

20世纪80年代，在“文革”中停刊的晚报纷纷复刊，与同期新创办的晚报、专业报一起改变了党报一统天下的报业格局；电视事业突飞猛进，普及率迅速提高，吸引了很多观众。90年代以后，嫁接了晚报和机关报特色的都市报开始登上报业舞台，并迅速形成与党报、晚报三足鼎立之势；互联网也开始分流党报原有读者。新世纪以来，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又进一步蚕食着党报市场。在这些媒体一轮又一轮的冲击之下，很多党报发行量减少，影响力也相应地下滑，有些党报甚至陷入了生存困境，出现了被边缘化的趋势。

很明显，党报影响力的下滑使它不能充分履行党的宣传机关的神圣职责，不能圆满完成党的各项宣传任务。作为执政党的机关报，党报理应主导社会话语权，把握舆论引导主动权，成为“社会思想的灯塔”^①，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舆论环境和物质基础，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和强大舆论力量。而实现这些目标，又离不开对读者市场的占领与开发。只有成为“既有很高的权威性、指导性，又有强大的吸引力、影响力、感召力、凝聚力”的主流媒体^②，党报才能承担起党委机关报的重任，才能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的身份相适应，才能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服务。

^① 刘建明：《把党报办成高级报纸》，《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 2005 年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4 页。

^② 王晨：《努力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 2006 年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 页。





做到这一点，要求党报努力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与时俱进地开展工作。党报的发展与党的事业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而后两者是变动不居的，因而党报也不断面临着新的形势、任务、机遇和挑战，其办报理念、报道方式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和创新。应该看到，与革命战争年代和党在全国执政初期相比，党报的办报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中国“三变”、世界“三化”。中国“三变”是指：政治上我们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经济体制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外交格局上由全面受封锁向全面对外开放转变。世界“三化”是指：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①。党报对这些变化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不适应，原来的办报模式和理念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发行量减少、影响力下滑就是这种不适应的一个突出表现。

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集体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对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用时代的要求来审视宣传思想工作，用发展的眼光来研究宣传思想工作，以改革的精神来推动宣传思想工作，努力使宣传思想工作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②。按照这一要求，党报人重新审视着党报的生存环境，努力探索新形势下行之有效的办报手段，一些党报积极参与新闻市场竞争，报

^① 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课题组：《试谈十六大以来党报的新闻宣传工作》，《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 2006 年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03 页。

^② 《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宣传思想工作》，《人民日报》2003 年 12 月 8 日，第一版。



纸的贴近性、可读性增强，发行量稳步上升，保持了自身的强势地位。但仍然有部分党报没有认清自身生存环境的变化，或是虽然认识到了这一变化，但改革的决心不大，力度不够，措施不力，导致与市场的距离越来越大，离读者的需求越来越远，在媒介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面临着读者、广告、人才的多重流失，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都没有太大的起色。

以党报的生存环境为研究对象，就是要归纳出目前党报生存、发展、壮大的种种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探寻党报影响力下滑的原因，并结合一些党报的成功实践提出党报提高影响力的有效途径，给相关管理部门、党报和党报工作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使党报在认识自身生存环境基础上适应和改善自身的生存环境，在激烈的竞争中抓住机遇，扩大市场份额，赢得更多的受众，以最大限度地增强党报的吸引力、影响力、感召力、凝聚力，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交付的重任。



第一章 党报生存环境回顾

自诞生之日起，党报就不可避免地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读者等各个方面产生复杂而微妙的联系，受到方方面面的影响，并在这种种影响中不断加以变化调整，以增强自身的影响力。如果无视这些变化，一成不变，就有可能被边缘化甚至被淘汰。从历史上看，党报也正是和着时代发展的脉搏与时俱进，努力适应并改善自身的生存环境，进而发展壮大。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党报生存环境简述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舆论机关，党报随着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党的壮大而壮大，其生存环境与党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党的生存环境好，党报就会迎来较好的发展机遇；党受到压制与迫害时，党报生存环境也会同时遇到严峻的挑战。这一点，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党报生存环境中得以具体体现。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是以革命党的形象出现



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并发挥作用的（后期在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执政），其主要任务是带领工农群众夺取政权，因而从其出现之日起就受到统治当局的压制。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发动群众的党报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一、党报早期的生存环境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致力于建立一个以党的机关报为中心的革命报刊系统。但由于这一时期党的各项工作刚刚起步，力量还很薄弱，在政治上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因而其领导的党报也常常遭遇统治阶级的全力打压。1922年9月13日，中共中央第一个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在其出版过程中，中外反动势力对它进行了种种迫害：上海租界巡捕武力搜查上海大学《向导》通讯处，北洋军阀政府通过邮局先是暗中没收、后又公开下令查禁^①。

国民党在全国执政后，作为革命党的中国共产党受到严密控制，随着党的影响逐步扩大，作为党的宣传者、组织者的党报也日益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重视，办报环境日益恶化，出版难度加大。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弥漫全国，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到上海，转入地下活动，继续领导革命斗争。这种状况下，党报很难公开出版发行。为了向国统区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集团的真面目，中共中央以及各级党组织秘密从事办报宣传活动。中共中央先后在上海创刊及复刊了《布尔塞维克》《红旗》周刊、

^① 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页。



《上海报》《红旗日报》《无产青年》《中国工人》等报刊。其中中共中央理论性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于1927年10月24日在上海秘密创刊时，正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为了迷惑敌人，免遭迫害，该刊自1929年起采用伪装封面和不断改换刊名的方式发行，曾用的化名有《少女怀春》《中央半月刊》《新时代国语教科书》《中国文化史》《中国古史考》《经济月刊》等等^①。正常情况下，强化刊名、凸显自己的编排风格是形成品牌、吸引读者的一个有效手段，主办者会想方设法突出刊名，而《布尔塞维克》为了生存却不得不违背这一规律，频频更换刊名。由此一端，可见当时党报生存环境之艰。

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相应，国民党的新闻统制思想与政策也开始形成并不断发展，尽管这些思想与政策并非专门针对党报，但确实为党报的发展设置了很大的障碍，而且很多情况下这些政策出台的动因之一也是对党报进行限制。黄瑚教授所著《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对这一时期国民党的主要新闻统制思想做了如下总结^②：

1928年，国民党提出了“以党治报”的方针，要求国统区所有的新闻事业，包括非国民党的新闻事业，都必须接受国民党的思想指导和行政管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统治面临严重的危机。为了对付日益发展的进步新闻宣传活动，国民党统治集

① 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页。

② 相关论述参见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172页。



团大量汲取了当时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法西斯主义的新闻思想与经验，以进一步严密控制新闻界。

一是效法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至上”的原则，利用民族危机，大肆鼓吹和提倡“国民”“国家”“民族”等抽象观念，进行所谓的“民族主义的新闻建设”，凡是反对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一律以危害“国家”“民族”利益为由予以取缔与镇压。

二是加强新闻界自身的控制力量，利用新闻的力量来实行所谓的“科学的新闻统制”，即按照法西斯主义的原则改造新闻事业，将国民党的新闻事业和非国民党的新闻事业统筹规划、统一管制。

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实行积极影响非国民党的新闻事业的政策，将政治统治渗透于新闻业务活动之中，渗透于新闻从业人员的人事管理、新闻事业的行政管理以及新闻报道内容的审查等各个方面，从而“消灭反动报纸及通讯社，取缔灰色新闻及毒素新闻，淘汰肤浅落伍、桀骜不驯之新闻记者，其有冷酷无情、始终自外革命集团、绝无合作诚意者，尤不容留”。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明确表示要“对于全国报业，实施有效之统治，分别予以切实之扶助或严厉之取缔”。

为保证其新闻统制思想的实施，国民党政府制定了一系



列法律法规，对新闻传播活动给予限制^①：

1928年2月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党内各派达成统一协定后不久，国民党当局颁布《暂行反革命治罪法》《中华民国刑法》，严惩一切不利于国民党统治的宣传出版活动。《暂行反革命治罪法》第6条明确规定：“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者，处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中华民国刑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民国刑法施行条例》规定了意图破坏国体、变更国宪、颠覆政府者的内乱罪，以及妨害国交罪、妨害秩序罪、思想罪、意图罪等，使新闻报道与宣传活动处于临深履薄之境地。

1928年6月间，国民党中央制订与公布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指导党报条例》《指导普通刊物条例》《审查刊物条例》。根据上述三个条例的规定，所有报刊均须绝对遵循国民党的主义与政策，服从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部的审查。

1929年1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会议通过了《宣传品审查条例》，规定报纸、通讯稿等宣传品须呈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审查，“各省、各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应负审查其所属区域内一切宣传品之责，并将审查意见检附原件呈报中央宣传部核办”，“各级党部及党员印行之宣传品及与宣传有关之刊物，均须一律呈送中央宣传部审查”，凡宣传共产主义、反对国民党政纲、政策的宣传品须予以查禁、查封或究办。

^① 相关论述参见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184页。



1929年8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修正通过了国民党中央第三十一次常会备案的《出版条例原则》，规定一切出版物均应向国民党政府有关机构登记，凡宣传反对国民党的革命或进步思想、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法令，“妨害治安”和“败坏风俗”的出版物不得登记。9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三十三次常务会议又通过了《日报登记办法》，同月23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第三十七次常务会议再作修正。该《办法》规定：“在出版法未颁布以前，各种日报均须遵照本办法办理登记”，登记机关为各省、特别市党部宣传部，“登记之最后审核，由中央宣传部办理之。”建立报刊登记制度的目的，就是要取缔一切不利于国民党统治的报刊。

自1932年起，国民党当局颁布了《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新闻检查标准》《各省市新闻检查所新闻检查规程》《各省市新闻检查所新闻检查违俭惩罚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有关新闻检查的法令，将出版后审查制度改为出版前检查制度。这些法令规定，“各重要都市遇有检查新闻必要时，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核准，得设立新闻检查所，受中央宣传委员会之指导，主持各该地新闻检查事宜”。“凡在各省、市印行之日报、晚报、小报、通讯社稿及其增刊、特刊、号外等，于发行前均须将全部新闻一次或分次送各该新闻检查所检查”。新闻检查的范围，虽有“限于军事、外交、交通、地方治安及有关之各项消息”的规定，但在实际执行时则将一切新闻报道均列入检查范围之内。对于违检的报社、通讯社，则予以忠告、警告、有期停刊、无期停刊的惩